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文心雕龙注释

刘勰著 周振甫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文心雕龙注释

刘勰著 周振甫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注释/(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2. 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26-0

I. 文… II. ①刘…②周… III. ①文心雕龙 -
注释②文学理论 - 中国 - 南朝时代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58 号

责任编辑:降 云
责任印制:李 博

文心雕龙注释
Wen Xin Diao Long Zhu Shi
刘 勰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875 插页 2

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26-0/B·230

定价 26.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例 言

一,本书用黄叔琳《文心雕龙》本,参照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的校本,兼采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及补稿和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新书》和《文心雕龙校证》。范、杨、王三家不仅吸取了前代和当代各家校勘上的成果,他们在校勘上也都有贡献。如《声律》篇:“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范注据《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引此作“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指出无下“吟咏”二字。又如《乐府》篇:“缪袭所致,亦有可算焉。”杨校:据唐写本“致”作“改”,“袭”作“朱”,“朱”当作“韦”,草书形近而误,魏缪袭改汉短箫铙歌为魏曲,吴韦昭改为吴曲。又《总术》篇:“奥者复隐,诡者亦典。”王校:“典”作“曲”,与上文联字为义,全句通贯。经过三家吸取前人的成果,再加上新的校正,使《文心雕龙》更可读了。本书把范、杨、王三家校注中校出的误字、衍文、脱字、倒文增补改正。原文是错误的、多馀的、或有更好的字可换的,一律加上方框,把增补改正的文字用小字插入,来和原文区别。如《声律》:“夫[商徵]宫商响高,[宫羽]徵羽声下。”“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这里表示原文“商徵”“宫羽”是错的,当删去,改作“宫商”“徵羽”;原文“文章”后面脱去“关键”两字,应当补入。校文中所列各家姓氏主要如下:梅指梅庆生音注,冯指冯舒校宋本,王指王惟俭训故,黄指黄叔琳辑注,孙指

孙诒让《札移》，顾指顾广圻校本，铃木指铃木虎雄校勘记，赵指赵万里校唐人残写本，孙指孙人和校唐人残写本、明抄本、《太平御览》等，范、杨、王三家也分别注明。其他各家，参见范注及王校证，不尽列了。

二，《文心雕龙》有明代杨慎和曹学佺评本，清代黄叔琳和纪昀评本。这些评论可供参考。其中有些意见对我们有启发。像《原道》纪评：“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这里指出刘勰标举自然的原因。《明诗》讲古诗“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怛怛切情。”杨评：“评《古诗十九首》得其髓者。”指出论点的精当。《祝盟》里刘勰对臧洪献辞、刘琨铁誓稍有讥评，黄评：“二盟义炳千古，不宜以成败论之。”对刘勰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风骨》先讲风，再用风骨承接，单起双承。曹评：“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这里说明风、骨、气的关系，对我们理解风骨有帮助。当然四家评点也有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有分析地对待，但它们总不失为可供参考的资料。现在把四家评语附后。评语有涉及注释的，注中已详，从略。

三，注释通行的有黄叔琳辑注，范文澜同志详注，杨明照先生校注拾遗和拾遗补注，王利器先生的《校证》中，也有涉及注释的，以范注最为详备。以上三家注皆详于典实。本书于三家注所未及的词语稍稍加注，以求通俗。范注于原书中选文定篇，多全文录入。今结合原文，稍加节引，以能说明原文为止。

四，注释中引用以上三家注中典实，概不注明，以避繁复。引用三家注意见及王校注考辨时，分别注明。又引用杨明照

先生拾遗补注，时补注尚未发表，注明杨注。范注功力极深，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但以《文心雕龙》徵引之博，传写之误，或有待于补正。杨的补注颇有补正的。如《总术》：“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范注：“动用挥扇两句，未详其义。”杨注：“二语既承上张琴句，其义必与鼓琴事有关。《说苑·善说》：‘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初终而成曲。’”因知“动用挥扇”为“动角挥羽”之误。与《善说》正合，发前人所未发。又《情采》“间色屏于红紫”，范注：“红紫疑当作青紫，上文云‘正采染乎朱蓝’。”杨注：“按红本间色，其字未误。若改作青，则适为正色矣。《环济要略》：‘正色有五，谓青赤黄白黑也；间色有五，谓绀红缥紫流黄也。’”王校证也有补正，如《史传》：“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范注：“荀不知是何人。”王校证引《华阳国志·后贤志》，称“荀勖、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又“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范注：“粲书亡佚，彦和所云，无可徵实矣。”王校证引《史通·序例》：“唯令升（干宝）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蹶其踪。”指出干宝立条例先于邓粲，可补刘勰的不足。杨、王二家所未及，偶加拾补。如《哀吊》“后汉汝阳王亡”，范注：“汝阳王不知何帝子……无可考矣。”查《御览》五九六引作“后汉汝阳主亡”，汝阳主刘广，和帝女，封汝阳长公主，见《后汉书·后纪》。又《书记》“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范注引《文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用李善注，未指出刘勰以此书为赵至作之误。按此书开端称“安白”，明非赵至书。李周翰注据干宝《晋纪》，定为吕安与嵇康书，与“安白”相合。书中称“披艰扫秽”，“平涤九区”，针对司马氏篡权，故吕安与嵇康因而被杀。嵇绍讳言，

改为赵至书，刘勰于此失考。陈新同志审订本稿时，于范注亦有拾补。如《颂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范注：“纪传后评者，谓《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云作《五帝本纪》第一之意。《汉书叙传》亦放其体，而云述《高祖本纪》第一。”陈新同志认为“纪传后评”即本纪列传后的“太史公曰”，《汉书》称为“赞曰”，故云“亦同其名”，即同称为“赞”，非指自序后的自述作意。又《风骨》“务盈守气”，陈新同志认为“守气”本于《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论周单子“视下言徐”，以为“无守气矣”，“其将死乎”，范注未及。又间采今人新说，如《明诗》中论及古诗十九首作者时代，引金克木先生《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

五，范注“探求作意，究极微旨”，附见注中。此外，有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皆探索每篇义旨。本篇于每篇注后附有释义，间采范注与黄刘两书。于时贤考订文字间有异同的，亦稍加辨别。如于《刘勰传》后辨其卒年，于《隐秀》篇后辨补文之是否可靠。

六，释义分论各篇，前言总论全书，互有详略，凡释义中未详者，或前后各篇互相照应处即详于前言。由于水平所限，注释与释义一定有错误或不当处，务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注释承陈新同志指正多处，谨此志谢。

前 言

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写定以后，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跟着文学风尚的不同而变化的。刘勰要使自己的著作取定于当时文坛巨子沈约，沈约看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沈约推重这本书是确实的，因此刘勰就在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但沈约写了《棋品序》，没有给《文心雕龙》写序，可见他对这本书的估价还是不够的。原来沈约对于文学的看法注重声律，“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宋书·谢灵运传论》)。那末他所大重的，主要是推重刘勰的《声律》篇。但《声律》在本书中不属于“文之枢纽”，不属于论文的主要部分，沈约自然不可能对《文心雕龙》作出真正的估价。后来，刘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本传)。但萧统对文学的看法，把经、子、史都排斥在文外，对刘勰把经子史都纳入文中自然无法赞赏。所以本书在南北朝时代并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到了初唐，声律论发展成为律诗，声律的问题解决了。论文不再受到萧统排斥经子史于文外的拘束，看重史文，骈文还受到推重。于是刘知几在《史通·自序》里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味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揜揜，故刘勰《文心》生焉。”这才看到刘勰识解的圆

通，能够赏识文学的甘辛丹素，对这本书的认识进了一步。

刘勰的《原道》《徵圣》《宗经》，没有得到南北朝时崇尚声律、对偶、辞藻的文学家的赞赏。到了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发动了古文运动，主张原道、徵圣、宗经，和刘勰的主张一致了。可是韩愈是反对骈文而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声律而讲“文以气为主”。刘勰的著作是骈文，他提倡声律、对偶、辞藻，那他的著作自然不可能得到古文家的赏识了。

到了晚唐，古文和骈文之争又趋和缓。这时，人们又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陆龟蒙说：“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老，骚怨明湘累（屈原）。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峨。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羸。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纓纚。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皆由内史意，致得东莞词”（《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这是唐人最推重本书的话，评价得比较全面。指出它立本、驱宏，显得它能为探本之论，规模宏大；指出它开户牖，有创见；是囊中锥，能脱颖而出；但非倚天剑，不把它评价过高。指出它由内史意，如内史的诏王治，有助于治道。这比刘知几的称赞更显得全面些。

到了宋朝，欧阳修继承韩愈发动古文运动，加上道学家重道轻文，本书又不被称赏。黄庭坚《山谷书牋·与王立之书》：“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二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只赏识本书中的讥古人，论文病，未免所见者小。明曹学佺称：“文之一字最为宋人所忌，加以‘雕龙’之号，则目不阅此书矣”（《文心雕龙序》）。

到了明朝，李梦阳、何景明崛起，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

唐，非是者弗道”，“古文之法亡于韩”。于是南朝的骈文同唐宋的古文都被贬斥，这也破除了古文家对骈文的轻视，本书又受到看重。张之象序称它：“扬摧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器，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指出它的文论有独断的创见，可以启发后学。

到了清朝，本书更受重视。章学诚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文史通义·诗话》）。又称“自出心裁，发挥道妙”（《校讎通义·宗刘》）。谭献称：“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雋。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述圣宗经，所以群言就冶，众妙朝宗者也”（《复堂日记》）。

姑且不论这些赞美的话是否恰当，从这部书在历代的遭遇来看，当本书所用的骈文受到古文家的歧视时，它就不被重视，抛掉了这种歧视，就越来越受到看重，越来越看到作为文学理论上的价值。所谓“体大而虑周”，“文苑之学，寡二少双”，都是作为文学理论著作来推重的。

—

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要论世知人，看他在文学理论上比前人有什么发展，在文学批评史上占什么地位，看他对当时和以后的创作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值得借鉴的。这样，是不是可以对它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刘勰的生平 《梁书·刘勰传》里作了简略的叙述。关于他的生卒，范文澜在《文心雕龙·序志》注里考定他的生卒

约为宋泰始元年(465)到梁普通三年(522)。那是根据《文心雕龙》写定之年推算的。刘毓崧认为《时序》称“皇齐驭宝”，“于‘齐’上加一‘皇’字”；“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东昏也。”因此推定《文心雕龙》约写定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序志》称“齿在逾立”才著作《文心雕龙》，上推三十多年，刘勰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前后。刘勰把《文心雕龙》送请沈约鉴定，当在齐末梁初，所以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就“起家奉朝请”，当是沈约推重后的事。他在梁代做东宫通事舍人等官，曾上表请改用蔬果来祭天地。按《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517)十月，开始用蔬果祭宗庙。那末刘勰上表当在这年十月以后。他上表后迁步兵校尉，当在十七年。僧祐在十七年五月卒(《高僧传》)。梁武帝派刘勰去与慧震整理经藏，当在僧祐卒后，可能在十八年。整理经藏当需要几年工夫，完成后出家，出家后不满一年去世。他的去世当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前后，约五十八岁。〔1〕

刘勰的家世，本传称“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宋书·刘秀之传》称刘秀之“家贫，求为广陵郡丞”。又说他是“刘穆之从兄子也”。又《刘穆之传》称穆之做琅邪内史府的主簿，是宋高祖的心腹大臣。他自称“家本贫贱，贍生多缺”。刘裕上表称他“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可见和秀之都是出身素族。刘

〔1〕 关于刘勰卒年问题，见本传注后说明。

勰的“父尚，越骑校尉”。当时的士族，在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享受，在政治上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士族做官，担任清要之职，象秘书郎、著作佐郎，很快可以升迁；或黄门侍郎和散骑侍郎，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因此像刘秀之的求为郡丞，穆之的任主簿，刘尚的任越骑校尉，都不属于士族入仕的清要之职，也可见刘勰一族是素族而非士族。刘勰家贫，“依沙门僧祐”，他的《文心雕龙》写定后，装作“货鬻者”去干求沈约，这些也显出他是素族寒门。

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本传）可见刘勰的依靠僧祐，同投靠庙宇来逃避租役的不同，是替僧祐编定经藏。经藏编定后，僧祐又“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慧皎《高僧传·释僧祐传》）。既然经藏是刘勰编定的，那末僧祐使人编定的《三藏记》等五部书，可能都是刘勰编定的。范文澜称：“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条理明晰若此”。他对经藏“区别部类”，同于“论文叙笔”的“固别区分”。至于“纲领明”，“毛目显”（《序志》），同编经藏的要明纲领，显毛目也是一致的。

刘勰“博通经论”是不是用佛教的因明（相当于逻辑）来立论呢？从《文心雕龙·论说》看，应该是的。唐玄奘的《因明入正理论》提出“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指出论辩分真能立、真能破与似能立、似能破，都是启悟他人的。《论说》指出“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

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这里指出“辨正然否”，就是分别真能立、真能破与似能立、似能破。指出“破理”，正指两种“破”说的。“越理横断”是似能破，“反义取通”是似能立。这种似能立和似能破都不是真能立与真能破，就其“似”说，是“览文虽巧”；就其不是“真”说，是“检迹如妄”。又说：“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偏解即似能立、似能破，正理才是真能立、真能破。

《因明入正理论》又说：“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指出真现量、真比量与似现量、似比量都是自己悟入的。现量相当于直觉，如色、声、香、味、触；比量相当于推理，如见烟推知有火。《论说》说：“穷于有数，迫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有数同无形相对，包括现量的直觉在内，无形指比量的推理。对现量所感觉到的要“即坚求通”，对比量的无形的推理的要“钩深取极”，进行推理。不论直觉和推理都要透过表象求得自悟，所以都是“百虑之筌蹄”。这里也有“辨正然否”，即有真现量、真比量与似现量、似比量的分别。刘勰《文心雕龙》的所以立论绵密，这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

刘勰出身庶族，这跟他的著作《文心雕龙》有没有关系呢？有的。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在《程器》篇释道：“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生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刘毅已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议，宋齐以来，循之未改。”“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在《程器》里刘勰有没有这种感叹呢？他叹息“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他所说的将相有管

仲、吴起、陈平、绛、灌，都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他说的文士，像孔融、陆机倒是世族。因此，他并没有士族和庶族不平的感叹，刘永济的议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那末在《程器》里有没有反映他出身素族的感叹呢？有。当时的士族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不肯“屈志戎旅”（《宋书·王昙首传》）。于是庶族出身的将吏，便以军功进身。《程器》里感叹道：“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这是针对当时士族鄙薄武事，将吏不习文事的感叹。当时的士族，盘据高位，不屑留心吏治，崇尚玄虚。他们只关心保持门阀世族的地位，对于政治的得失，朝代的更换，反而像与己无关似的。因此，《程器》里提出要“发挥事业”，“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是针对士族的崇尚玄虚说的。正由于他出身素族，所以他的《程器》针对士族的这种流弊说，正如同他的论文，要“矫讹翻浅”，纠正淫滥，又是针对士族的文风说的。

刘勰所处的时代 刘勰经历了宋齐梁三个朝代，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这个变动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从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大一统以后，豪族地主纷纷武装割据，东汉时州郡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遭到破坏。魏文帝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在政治上给与豪族地主特权，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从两晋到宋齐时代，经历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争夺政权的长期战乱，分成南北朝，南朝更要取得从中原迁来的和南方土著的豪族地主的支持，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世胄握高位，英俊沉下僚”。刘勰出身寒门，只好“穷则独善以垂文”，去著作《文心雕龙》，想取得有权力者的赏识，达到“达则奉时以骋节”（《程器》）的目的。

再就当时的学术思想说，东汉王朝提倡今文经学，宣扬谶

纬迷信。到东汉后期的马融提倡古文经学，不宜扬谶纬迷信，兼注《老子》。马融是大儒，这说明儒家学风开始在变。到曹操提倡刑名，儒家礼教更受冲击。王弼、何晏用老庄思想来讲《易经》，《易》与《老子》《庄子》称为三玄，玄学盛极一时。宋文帝时，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说明玄学虽然盛行，但封建王朝还得依靠儒学的礼制来治国。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徵圣》《宗经》，正是这种推重儒学思想的表现，他的提倡“自然之道”（《原道》），又是受玄学的影响。

再就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看，早在后汉灵帝，“颇好俳辞，下习其风，益尚华靡”。曹操著重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加上礼教受到冲击，道家思想抬头，“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汉末，“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晋初，“潘陆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更其崇尚华藻。“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殫乎此。”（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也指出后汉灵帝“时好辞制”，“招集浅陋”。东晋时“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时序》）。批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明诗》）。刘勰还指出当时文风的流弊：“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贵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后来裴子野撰《雕虫论》，指出“淫文破典，斐尔为功”，跟刘勰的批评是一致的。

再就汉末以来的文学理论说，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里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种理论适应于当时追求文辞华靡的需要。刘勰恢复了儒家“诗言志”的提法，还提出“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提出“顺美匡恶”的美刺作用。这是为了要挽救浮靡的文风。

总的看来，刘勰认为“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明诗》），对玄学是贬抑的；但说“何晏之徒，始盛玄论”，赞美他们的文章“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又极力推尊玄论了。“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对魏晋宋的文学是贬抑的；但又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赞美“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明诗》），又兼赞晋代作家了。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应该怎样解释呢？

章太炎《五朝学》称：“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迁，且翼扶之。昔者阮咸任达不拘，荀勖与论音律，自以弗逮。宗少文达生死分，然能为金石弄。戴颙述庄周大旨，而制新弄十五部，合《何尝》《白鹤》二声以为一调。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医术亦究眇微。雷次宗、周续之皆事沙门慧远，尤明三礼。关康之散发被黄巾，申王弼《易》，而就沙门支僧纳学算，眇尽其能，又造礼论十卷。下逮文儒，祖冲之始定圆率，至今为绳墨，其缀术文最深，而史在《文学传》（《南史》）。谢庄善辞赋，顾尝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合之则宇内一。徐陵虽华，犹能草陈律，非专为美言也。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凡为玄学者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审形度声则然矣。服有衰次，刑有加减，传曰‘刑名从商，文名从礼’，故玄学常与礼律相扶。”这是极力推崇玄学，推崇五朝学。同刘勰推“文章之用”，要“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相似。不过《五朝学》不仅认为他们通礼乐律令，通刘勰说的五礼、六典，还通算术、医学。玄学不是空虚，是审名定分，“其艺控实”。